

任彦芳文集

影视文学卷



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
参考文集

影视文学卷



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


任彦芳文集·影视文学卷

著 者：任彦芳

出版发行：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

印 刷：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480 千字

印 张：20.47

插 页：2 页

版 次：2000 年 5 月第 1 版，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：ISBN 962-450-328-1/D·41423

定 价：(平)人民币：32 元 港币：32 元

(精)人民币：36 元 港币：36 元

中国 80 年社会长镜头 (1918 – 1998)

雷声·风云·泥土



1959年北京大学电影剧本《雷之歌》创作组留念
前排从左往右：
张炯 任彦芳
后排从左往右：
杜学钊 张时鲁

1959春节去河南信阳，
听妈妈讲述过去的事情，写
电影剧本《妈妈的嘱咐》



1966年2月参加中央文化部《焦裕禄》电影创作组，在兰考采访，从左往右：第一人为作家李准，第四人为导演水华，第六人为任彦芳



1978年，获得平反后回到河北家乡，心中涌出了新的希望。



1979年9月，应北影邀请，重写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《雷声》时，摄于北影招待所



1983年创作电影剧本《荷花淀的女人》，倾听孙犁老师的意见，摄于天津孙犁寓所。



1982年4月，电影“风云初记”摄制组看外景地时与老导演袁乃晨摄于河北井陉街头

前记：我的影视长镜头

一、序曲：风浪红楼

1958年春天，北京大学16斋的一间校团委办公室里，中文系的几个“才子”、“才女”聚在这里，讨论写北大反右派斗争的电影剧本《风浪红楼》。这个集体创作是校党委按照北京市委布置的要求进行的。这里有谢冕、张炯、孙幼军、温小钰、刘登瀚、刘文昭，也有我一当年北大同学熟悉的诗人。

北大1957年1月创办的学生刊物，取名《红楼》旨在发扬五四传统，呼唤科学和民主。这个综合性文学期刊的编辑多是中文系学生。刊物编到5月份，一场风暴袭来，在大风浪中红楼编辑部分裂。5月20日红楼诗歌编辑张元勋同沈泽宜联名贴出大字报诗《是时候了！》呼唤高举五四火把，烧毁阳光下的“黑暗”，这是自由、民主的呼声，马上遭到反击。冲突日益激烈，多数编辑做出决议，开除张元勋、李任等。之后，他们另组成《广场》，先出大字报，后编辑成杂志，此时中央已发出“反右派”号令，《广场》便成为反党右派集团，最后一网打尽，开除校籍或去劳改或被逮捕……。

《风浪红楼》便是根据这场斗争创作的剧本，共议提纲，分

头执笔。我在这场风浪中因严重右倾，几乎翻船落水。此刻为报答党挽救之情，心中喊着“向左！向左！”，故甚出力，绞尽脑汁编造故事，丑化“右派”同学。剧本写出初稿，便得到北影编辑宋日勋、施文心（不知那时她生了葛优否？）大力帮助。从此知道了什么是“蒙太奇”，读了“格布里罗维奇”。

后得信息：对反右派斗争暂不反映，此剧创作停止。

今天想：如果真的写成，当是左的历史记录。

二、拒马河火种

1958年10月，北大图书馆阅览室。

我埋头写自己家庭历史的电影剧本《拒马河火种》。这年全国兴起写家史、村史；我回家乡开始收集父辈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故事，父亲是家乡容城县第一代共产党员，妈妈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，也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，成为当地第一个女共产党员。·我以母亲向我们讲述父辈斗争故事的形式，体现革命精神不能丢，要一代一代继承下去的主题。

剧本提纲寄给长影编剧胡苏，得到具体指导，便照他的意见写成剧本第一稿，改名《妈妈的嘱咐》寄长影。不久，派来编辑李家璋来京谈意见。我又改一稿，仍离拍摄有距离，此时方知写电影剧本不易！然而我不灰心，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外电影剧本。

根据电影剧本的部分情节写成了诗剧《铁窗红旗》，由北大话剧团公演；剧本刊载在1959年《北大青年》上。

三、从《雷之歌》到《雷声》

1959年1月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了红色中国文学史，引起全社会的注意，为什么不能在文艺创作上放一个“卫星”？

于是中文系 1955 级成立电影创作组，要创作一个反映五四运动的剧本，以纪念五四运动 40 周年。

创作组由四人组成：张炯、张时鲁、杜学钊和我。系主任杨晦，是当年“火烧赵家楼”中的主角，他做了我们剧本创作的顾问。

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出 1917 年至 1921 年的《晨报》《顺天时报》查看当年历史档案，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，翻阅资料数百万字，并采访了五四运动时代的老人和参加者，我们得到北京市委和北影的大力支持。当时采访过的有：魏建功、冯友兰、川岛、冰心、张恨水、刘清扬、李星华、许德珩、罗章龙、刘仁静、臧克家……等几十位前辈。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杨晦先生；谈天津“觉悟社”最详细的是刘清扬先生。

我们剧本的名字《雷之歌》，完成初稿（实是详细提纲），由学校打印，献给了五四运动 40 周年。

1959 年下半年，开始“反右倾”，我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人，便无心思去修改此稿。北影厂编辑部给我们以鼓励，要我们不要放弃这个题材。

1960 年大学毕业，杜学钊分配到南方去了；张炯分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，张时鲁分到中国剧协，我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。这年 9 月，由北影厂借调作者，我和张时鲁到了北影招待所，重新开始《雷之歌》创作。几经交涉，文学研究所不放张炯出来，那四人的创作组变成我和张时鲁合作。

著名导演，称北影四大帅之一的成荫看中了我们写的这个重大历史题材，在艺术上给予了指导。在北影三个月，又写成了一稿，由北影文学部正式打印，分送领导和专家，听取意见。

我拜访了当时正写《鲁迅传》的剧作家陈白尘。他说：写五四运动和我们写鲁迅，都遇到同样问题：对一些人物的历史评

价。因此，我们的剧本就此搁浅。

19年后的1979年。北影厂接受夏衍同志建议要写五四运动电影，“今日有四五，当年有五四，精神是相通的”。北影又记起了我们的《雷之歌》，便邀我再到北影招待所重写剧本。此时，原合作者张时鲁已调内蒙，张炯在文学所委以重任，难以抽出全部精力，他与我研究一段时间便回所去了。著名摄影家，导演朱今明决定导此剧本并发了消息，我终在1980年3月完成修改稿，改名《雷声》在电影创作杂志1980年7月号刊出。

雷声隆隆又滚过了四十年岁月，但至今仍未见到反映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搬上银幕。

四、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

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却是在1960年北影出品大型艺术记录片《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》里。我受北京市委之命，参予这部记录北京市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影片编写工作，市里派来了车乃刚，北影派出编辑宋曰勋，北大派我参予编辑写解说词。

1960年7月，当这部长艺术记录片在北大大饭厅放映时，我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，竟引起同学热烈地鼓掌。这掌声是对我日夜辛劳的回报，也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，那时便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写出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剧作来！

五、焦 裕 祿

1961年11月，我告别北京，调离中国文联，怀雄心壮志，迎刺面寒风，跨进长影大门。

1963年春节去河南兰考探望母亲，结识了县委书记焦裕禄；1964年5月，母亲因老焦逝世过于悲痛患病住院；我去探母，听妈妈讲老焦故事，感人下泪。1964年冬我向长影总编室及厂党委提出写焦裕禄电影剧本的请示，得到支持；1965年春节长影党委开介绍信到河南省委宣传部、开封地委宣传部。由中共开封地委领导组成“三结合”的《焦裕禄》电影创作组，开始广泛收集素材。1965年8月创作组人员全部参加兰考“四清”以更深入体验生活。

1965年12月，新华社记者穆青、周原等来兰考写出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长篇通讯；1966年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，全国震动。接长影党委电，要我立即离开四清工作队进入剧本创作。此时，中央文化部把创作《焦裕禄》的紧急任务下达给北影。北影主创人员导演水华、成荫，摄影朱今明，美工秦威及编剧李隼赶到兰考。经领导磋商结果，此影片由北影、长影合拍，我参加创作组与李隼合写剧本，自然是以李隼为主了。

从我1965年春第四次踏上兰考的大地（1962年10月我第一次到兰考，以后又来过两次）便下了“不写出焦裕禄，死不瞑目”的决心，且成了创作组的共同誓言，然而命运安排，却未遂人愿，这便成了终生之憾事！

1966年4月，创作组奉命回京整顿总结；1966年5月18日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召集创作组成员宣布，创作暂停，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八个月后，运动结束后重新搞此剧本。谁知此次“大革命”竟十年之久，从此再无集合之日了。

进入80年代末，北影厂约我再写《焦裕禄》并上报电影局，此时才知晚了一步，此题材已由峨嵋厂先报了。最先搞《焦裕禄》的长影，北影均未拍成此片，亦是憾事。

六、明天的审判

文革十年中，我先被打成“长影为刘少奇翻案反革命翻案集团”头头，接受审查；后又以“5·16反革命”罪去长白山劳改，先后共六年。1979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。此时，我根据对林彪在吉林省代理人王淮湘问题的揭发材料写出电影剧本《明天的审判》，这个动人心弦，发人深省的故事被导演陆建华看中，报长影请求拍摄，因剧本思想尖锐而不合当时“时宜”，未被批准。1980年在审判林彪、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前发表

七、白衣女魂

1969年11月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害死于开封古城。1970年4月，我到开封便听到群众中秘密传说，故事震撼人心。

1982年春，我把“白衣女魂”的故事说给长影老导演袁乃晨，他大为感动，让我立即写成电影剧本，他要在拍摄我编剧的《风云初记》时套拍此剧。我在1982年完成此剧。

1984年根据此剧写成的电影小说，在《影剧奇观》上发表。

八、风云初记

是孙犁老师的作品引导我热爱文学并走上文学之路，《风云初记》使我热爱，熟读多遍，不少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亲人。我早有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的愿望。1982年应长影之邀请，回到离开10年之久的地方，与多年想拍摄孙犁作品的老导演袁乃晨研究改编《风云初记》。

我的改编，得到了孙犁老师的认同和称赞，称剧作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。

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在长影讲话，称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可以使长影打翻身仗的好本子，希望长影做为重点片拍好。

由于导演袁乃晨过分认真、执拗，在拍摄资金上与厂领导发生矛盾，致使准备近一年的拍摄工作停止，另换了不熟悉北方生活的导演，且为了赶拍摄季节，把上下集合为一集，将四季景集中到一个季节，不经作者同意，任意删砍，使拍摄出来的影片完全失去了孙犁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。

我羞于承认我是影片编剧，并给孙犁老师写信，千万不要看此影片。

此剧未能拍好，是我影视路上的第二大憾事。

九、荷花淀的女人

1983年，应天津电影制片厂导演韩敏之约，将孙犁所有写白洋淀生活的短篇融为一体，重新构思，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年月妇女生活的电影《荷花淀的女人》，我的想法，得到孙犁老师的首肯；剧本得到孙犁的认同。

当时中央有规定，小厂不允许拍故事片。于是热爱此剧本的摄影师张保之又把此本介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；我听了八一厂导演李舒田的意见，1984年在河北省军区又重写一稿，由八一厂打印送审。在导演准备拍摄之时，白洋淀水干涸了！此剧拍摄事暂停，根据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建议，根据此电影剧本改成歌剧《她们的心》，由河北省歌舞剧院首演，并在1986年参加全国歌剧交流演出而获创作奖，受到贺敬之等同志称赞。

1988年白洋淀来水了，我把这好消息告诉给八一厂，而老导演李舒田却已不幸病逝，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这个电影，没有拍成，是他终身遗憾。

做为编剧，自然也同样感到遗憾。

十、泥土

1980年，全家从东北调到河北故土，在河北省歌舞剧院任专业编剧。1981年完成第一部歌剧《泥土之歌》，上报中央文化部。当时，从全国送来93部歌剧剧本，我的剧本竟荣幸地成了第一号种子人选。这年冬，入选的五个剧本作者奉命到京，专就剧本修改开座谈会，可见重视。中央歌剧院海啸、刘莲池等看中此本，决定排演；河北省歌舞剧院争首演权而不让。就在此时，剧院因分房问题引起风波。我因为知识分子抱不平反不正之风，得罪了剧院领导，此歌剧便停排了。

河北电视台导演罗捷找到我，把歌剧改成了单本电视剧《泥土》，河北台录制完成，成为献给党的十二大的主要剧目，受到好评，后此电视剧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，算是对歌剧未排演遗憾的一点补偿吧。

《泥土》是我写的第一部电视剧。

十一、夕照青山

一位八十岁的老人，原兰州某大学副校长，在“右派”改正后，回到河北赵县故乡办起英语学校，免费教孩子的事迹感动了我，我写了报告文学《夕阳与朝霞》发表在《长城》杂志上。电视台导演罗捷要我写成电视剧《夕照青山》，这是根据王佑民老人事迹写成的纪实性电视剧，几经波折，因资金不落实，未能录制。留下了剧本，做为对这位一生想以教育救国的老人的纪念。

十二、阴阳宅

1989年，我辞去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之职调到中国评剧院任专职编剧。到职后，我写出的第一部戏曲剧本就是《阴阳宅》，和我初到河北省歌舞剧院相似，此剧本曾引起关注，《新剧本》编辑们尤为推崇……因种种主客观原因，未能搬上舞台。

1990年冬，我去深圳西丽湖度假村休养，结识深圳电视台台长祝希娟，她看了舞台剧本很有兴趣，要我改成戏曲电视剧本。回京后，我立即改成一部戏曲电视剧，仍因资金不落实而放入箱底至今。

十三、新世纪的太阳……

悠悠岁月四十载……

我的影视长镜头就记录到此吧。除去上面提到的影视之外，压在我箱底的还有近两年应约写下的20集的电视连续剧两部提纲：一部是写白洋淀渔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生活巨变的《莲花淀春秋》，一部是神话传说《龙狮石》。

选入本集和未选入的作品，每个字都是我点点生命之血，是我心灵真诚的印记。四十年，我在影视之路上未获大成功，其一是自己才气不够。其二是天不助我，机会丧失。如《焦裕禄》未让我写；《风云初记》好本子拍糟；《荷花淀的女人》未拍成；其三是进入市场经济后仍不适应新的运作方式，等等。

我在本世纪之末，把四十年写的中国八十年长镜头编辑成书，以总结过去，迎接21世纪新的太阳；我已走过第一个花甲，迈入第二个青春岁月，在迎共和国百岁生日时，希望我的长镜头

能再造辉煌……

任彦芳

1999. 1. 9 北京

目 录

前记:我的影视长镜头	(1)
长镜头 1 雷声	(1)
长镜头 2 风云初记	(91)
长镜头 3 荷花淀的女人	(209)
长镜头 4 白衣女魂	(277)
长镜头 5 明天的审判	(339)
长镜头 6 泥土	(393)
长镜头 7 夕照青山	(435)
长镜头 8 阴阳宅	(517)
附录: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	(603)
《彦芳文集》影视文学卷后记	(639)